



韩素音 著
祝 珏 周漠智 周 蓝 译

残树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力平
十日十日
立日自传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韩素音自传

——残 树

韩素音 著

祝 珏

周谟智 译

周 蓝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90 号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韩素音自传—残树

韩素音 著

祝 珏 周谟智 周 蓝 译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邮政编码:100028)

经销者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南京 7214 工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60 千字 16.125 印张 4 插页

版 次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524-4/1·236

定 价 9.50 元

序

韩素音 Au Sui-jin

西哲有言，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终将在劫难逃。民族文化的幸存有赖于民族自觉及热爱这一文化的过去，有赖于有意识的确认其不断做出的努力与成就。这些努力与成就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蕴育了文化。

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至今还如此强劲有力，能够适应及生存于历史长河中的迭次变革，因为它能坚守历史的延续性。虽然这种对于过去时代的依恋，有时遭到批评和指责，因为它对新形势的适应过于迟缓。可是从时间递增的眼光看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中国较其他国家（除了日本），其变化是远为迅速的。

整个人类既是历史重大事件的产物，又造就了我们社会行动和我们的意识。作为一个欧亚人，介乎两种文化之间，我在数十年生活中比多数人更深感其相互的汇合与促进。这两种文化，对我个人性格的形成显示了巨大的历史性力量。

因此，我写这些书，不但是部自传，仅仅记录我个人的生活以及形成我性格的具体环境，而更为重要的是关连到当时的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这是一个初次尝试，我想通过个人或许多

“个人”，使历史知识易于被人接受；也许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个人，我在历史发展和受其左右的人们之间，发挥了它的一线牵连作用。

所以，这样的书写来并不容易。我的目的是要使读者注意到我们这些人，浮沉在历史的宏伟长河之中，巨浪时起时伏，我们既是它的组成部分，又是主体和活跃于其间的主要力量。

我的这些书，在某些西方大学里今天被作为值得研究的历史著作。但他们又可作为消闲的读物。这些书里并不尽是死者、枯骨、或是指导过生活的事迹与岁月的积聚，而是我们亲身经历过和意识到的一部分，构成我们的灵魂与决心。

“只有知道我们的过去，才可能使我们支配与塑造我们的未来”。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被孤立起来或者自我孤立于大地上其他国家及民族之外。我的这些书，我想是可以供给年轻人若干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读物；因为这些青年正在探索对于他们各自生活的意义。

(冯亦代 译)

第一章

1885年——1913年

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

今天我没有时间给你们写长长的信了,因为昨天晚上这儿来了土匪,他们砍了我们厨师的头。现在他的头还留在花园里,我只好一直把窗户关上。小宝宝长了痱子,哭个不停,可我又弄不到一点爽身粉。见信后请给我寄两打听装的爽身粉来。在英国这东西好买。我自己近来只好连紧身胸衣也不穿了,要是你们见到我整天穿着拖鞋,趿沓地走来走去这副样子,一定不会认识我了。

蘸水笔尖上粘上了一点墨水瓶里的残渣，在歪歪斜斜的一行字上拖着头发丝般一条墨迹，写到最后一个字时就成了一个墨团。玛格里特* 实在憋不住了。

“够了，够了，”她尖声叫了起来，“我受够了！”她一把推开椅子，两只手捧住额头，按紧太阳穴，泪水就像是一齐要涌了出来似的，顺着稀得几乎看不见的睫毛，流到干瘦的脸庞上。她一边呜咽着在屋里踱来踱去。“够了，实在够了！我的上帝，简直受不了啦！我收拾行李马上就走！”

这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几年来就不知说了多少遍。她不断反复地这么说，但是却一直留在中国。就是横不下一条心，一走了之。过去是这样，往后还是这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三十年，直到一场大动乱为她作出了最终的抉择。

房子四壁是肮脏不堪的石灰墙，顶棚是苇席铺的。夜间，耗子在上面乱窜，不断有泥块落下来。脚底下是泥土地，一方破地毯铺在塌陷的钢丝床前，摇篮里的婴儿不断地啼哭。这一切都洋溢着一种昏昏沉沉，麻木不仁的气氛。这也就是她所在的这个庞大而又陌生的国度所独具的那种无边无际麻木不仁的气氛。这种麻木比仇恨更教人透不过气来，比真空更加虚空，这块人口众多的国土由此变成了一片生意寂然大沙漠。她孤零零地陷进这茫茫的人海之中，陷身于这一片麻木不仁、尘土飞扬、肮脏污秽之中。就在这儿她钻进了一个永无出头之日的硕大的老鼠笼，整日不停地在那里踱来踱去。这只耗子笼，她当初是在爱情的驱使下跌落进去的。如今，

* 玛格里特是作者母亲的名字——译注

这爱情变成了孩子的啼哭声；变成了她腹中另一个小生命；变成了紧闭的窗户外面挂在木桩上那个厨师的头。那颗头招得苍蝇嗡嗡乱飞，正好下面是她丈夫两个月以前栽下的西红柿，现在已果实累累，枝头上挂满了一丛丛青色的西红柿了。

“够了，够了。我收拾行李就走！这下真到头了。”嘴里这么说着，她心里却想等着尝一口新鲜的西红柿呢！

她走到床前，从床下拖出一口皮箱。顿时两只手都沾满了土。尘土，尘土，到处都是尘土，没有一样东西上面没有土，你到哪儿也离不了脏土。她把箱盖掀开后又停了下来，皮箱张着大口像是在地毯上开了一口墓穴。“马上就走，就走。”她弯下腰对啼哭着的孩子说，“快别哭了！听见没有？你再闹我就——”话说一半她一下抓起孩子来，乱亲乱吻。“我的小心肝，小宝贝！”羊毛织的襁褓上，落上两只黑黑的手印，可是婴儿用的白色羊毛织物是很难洗干净的。

花园那边传来了笑声。

“又来了！愿上帝诅咒他们！诅咒他们！”

外边，就在那花园外边，在那挂着一个人头活像一个哨兵似的篱笆桩外边，围着一群人。他们站在那儿嘻嘻哈哈，对那幢住着外国女人的房子和那颗人头指指点点。妇女们满头尘土，黄泥般的头发梳成低低伏在脑后的小髻；孩子们有的站着，有的抱在手里。成群的苍蝇围着这些妇女，老头和仨两个小伙子嗡嗡地乱转。所有的人身上穿的都是教人讨厌的清一色的蓝布，虽然深深浅浅不同，但看上去也如同制服一样可怕。他们每个人都在笑，一会儿指指西红柿上方那颗头，一会儿指指住着外国女人的那所房子。现在这个外国女人露了面，更是引起一片哄笑声。

“笑啊！笑啊，你就把他们开膛破肚，他们没准还会笑！真是畜

牲！畜牲！”她扶住打开的房门大声呵斥起来：“畜牲！笨蛋！你们的脑袋总有一天都会给砍掉！蠢猪！”她比划了一个砍头的姿势，嘎地一声关上了门，震得天花板沙沙落下一层土，一只耗子“嗖”地一下从她头上的顶棚窜了过去。

外面的哄笑声在她叫骂的时候暂停了片刻之后又重新响了起来。这回没有人再注意木桩上的人头了，她自己成了唯一的被嘲弄的对象。

“洋鬼子！洋鬼子！洋鬼子！”

孩子们齐声大叫，一面笑，一面模仿她那个砍头的手势，在飞扬的尘土中又是跳，又是蹦。有的把脸蛋紧贴在篱笆上，等候房门再次打开，等着看这个怪女人再度发作起来，再听听她吱哇乱叫的吼声。这是一场他们百看不厌的好戏。整整一天，这群小孩都赖在篱笆旁边，眼巴巴地等待着。

玛格里特冲回到桌旁，钢笔又在纸上“嗖嗖”地写了起来，字迹歪向一边，越写越斜，等到最后一行，左边的字离底还差半寸，而右边的字已紧擦纸边了。

“……我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的笑声了。看见我在痛哭，他们却哈哈大笑；看见有人给砍了脑袋，他们也哈哈大笑。他们不是人！我决心回来……我要叫他今天就让我动身。我可不愿意让人家把我的头也砍掉。”

外边突然一阵嘈杂的声音，原来是围观的人群正挪动着让出一条路来。篱笆门格噠一声打开之后，只听见她丈夫的脚步声在紧闭的房门外停了片刻，接着，他就进了屋。她的丈夫来了。她满腔

怨气，——她美好的青春都白白消耗在气恼和吼叫中。在这耗子笼中她来回地踱步；在这紧闭的窗户后面，她躲躲藏藏，时间精力都浪费掉了。她满心期待别人会友好相待，理解她，却总是被人拒之门外。她心里又急又恨。一肚子的怨气这时统统古脑儿发泄在丈夫的头上。

“映彤，我已下定决心了，我今天回国。马上就动身！”

他叹了一口气，坐在床上，用脚把开着盖的皮箱推开，开始解鞋带。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听见没有？我再也受不了啦！”

“玛格里特，你太神经质了。”

“神经质？你就只会说这句话——我神经质！你自己出去了，把我一个人丢下和这帮——”她用手指了指窗——“谁还能不神经质？想想昨天夜里的事情，能不神经质吗？当初我以为我们会去一个文明的国家……可你们的人野蛮得很，一点不文明。你听听他们那种笑法……你骗了我，你是把我骗来的。”

“我另外找了一个厨师，”她的丈夫说道。这时候他已解开了靴带（他因为成天要在新修的铁路上走来走去，路上有蚂蝗，有时还有蛇，就不得不穿上靴子。但皮靴太硬，磨破了他的脚趾）。“厨子今天下午就来。他以前给一个比利时人家（就是泰迪安家）做过饭。”

“我要走了。你去和你的厨子呆着吧。我非走不可。你一定去给我买一张下一班的轮船票。听见了吗！我非走不可。”

“玛格里特，你知道铁路已不通车了。昨天晚上一些军阀在丰台枪杀了十二名工人。再说，”他补充道，“你自己的国家也在打仗。在和德国人打。你没法回去，——战争没有结束之前，没有轮船

啊！”

落入陷阱了！她到处都碰上陷阱，事事都碰上陷阱。玛格里特往椅背上一仰，抽泣起来。她用作信笺的一张薄薄的透明纸接住了她的泪水。后来她又继续在这张泪痕斑斑的纸上接着写信，描绘了当时的景象。

“现在他们总算来验收这颗人头了。走在队伍前面的吹鼓手，吹吹打打，这些都是村子里的无赖。死者的老婆在后面跟着，号响大哭。但是我看得出来她一点也不伤心，因为她一滴眼泪也没有。当她发现我时，就停下来，盯着我看。她只有把手捂住了嘴巴才没有笑出声来。他们根本不是人。亲爱的爸爸和妈妈，我决不能再呆下去了，战争一结束，我立刻回家。”

1958年初夏一个凉爽的日子。我和哥哥子春坐在巴黎的蒙帕纳斯车站一家咖啡馆里。我把这封勾起我们许许多多往事的信笺叠好。信中那个哭闹的婴儿是谁呢？很可能就是我。那是哪一年？1917年？1918年？还是更早一些？信上的日期是三月十七日，但没有写明年份。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某一年中我母亲写给她父母的一封信。当时我外祖父母正带着我哥哥子春在英国躲避战乱。

现在子春已经俨然是垂垂老矣。高度近视眼、平头、衣衫半旧。他就这样坐在巴黎某火车站一家咖啡馆餐桌前，面对着我。他刚刚把这封过去岁月里的信交给了我。这也是过去留下来唯一的一封信。子春把母亲所有的信全付之一炬了，就只留下了这绝无仅有的

一封。

“你看，我连做梦也想不到你居然有一天会需要这些信……”

信有满满一箱，一大箱呢！子春在咖啡杯上用手比划着箱子的大小。“妹妹，我当时如果知道你有一天还需要这些信，我当然会好好保存的。可那时你还很小，我哪能想到你会想看这些信呢？”

“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说。

于是，我对于过去的寻访到此又告一段落。这次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一封信。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可为什么单单保存了这一封信？也许是作为焚化信件的一个象征性的纪念吧。正如在人体火化之后，总要检出一小撮骨灰，一束头发留作纪念一样。另外，看到目前母亲信中歪歪斜斜的一行行字迹向我们厉声倾诉她的苦难，就像她在哥哥和我小时候厉声呵责我们一样。这封信之所以留到现在，也许是为了从母亲的不幸中得到某种补偿吧。

“你上火车的时间到了，我真希望你能在这里多住几天。”

我两眼望着哥哥。尽管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发生了许多变迁，我和哥哥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哥哥说，我们彼此都很了解。可是我看他讲的未必对。因为我敢肯定他未必知道我有多么任性，什么都干得出来；而我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这么封闭，生活圈子这么小。后来，很长时期内我都想不通他怎么会这么潦倒。我忍不住向他问道：“你觉得幸福吗？”

“是的，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虚度一生。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无用的人。”

我们走上车站的站台，一列列火车紧挨在一起像牲口棚里的牲口，虽脏却毫不在乎。一阵车站上特有的腥臭味扑鼻而来。

子春说：“火车，火车，到处都是火车。如今中国的火车准时

吗？”

“现在都很准时。”

“太好了，我听了真高兴。记得吗？咱们父亲老为火车的事情发愁。他老人家晚年这段岁月一定过得很愉快。他的一生都交给了铁路。在汉语里铁路就是铁打的路，是吧？我有时觉得他最心疼的就是铁路，甚至胜过心疼他的子女。至少胜过喜欢我，他的儿子。他从来没有时间关心别的事情，是吧？”

子春像一块木桩一样站在我车厢的窗外。机械地向他身边掠过的一节节车厢挥手示意。他的眼镜片上很快就遮满了尘土。这副样子使我突然想到那个厨师的脑袋。那封信就装在我的提包中，那是我母亲满满一箱家信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封信。

车厢内座位极脏（为什么欧洲一般小城市的火车这么脏，比中国今天的火车脏多了！）。我坐在上面，心里对子春哥感到又气恼，又同情。但气恼也罢，同情也罢，又有什么用？我多么渴望读到母亲写的信，这么多信，而他却统统付之一炬！母亲的信包括了她在中国度过的一生，从1913年开始一直到天知道什么时候，至少一直写到1940年她父亲（也就是收信人）去世的时候。我母亲先是写给她的父母二人，后来她母亲去世之后，就单写给她父亲一个人。就这样写啊写啊，写了数不清的家书，究竟写了多少封呢？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当我感觉到世界上除我之外还有母亲的存在时，她给我的印象就是伏在桌上的样子，现在我的耳边仿佛还能听见她摆弄信纸的沙沙声。记得我那时就问过她：

“妈妈，妈妈，‘写’是什么意思？接到信的人，怎么看得出你说什么？”而她给我的回答总是“别吵。等你长大了一点，你就明白了。”

我哥哥把她的信全烧掉了。她家更没有任何别人有她的信。(她家的人我都挨个去找了,我去过安特卫普、布鲁塞尔、还有洛万。可是他们都只能讲一些往事,告诉我一点他们个人记忆中的往事,却找不到一封信。)哥哥这个傻瓜,可怜的傻瓜!一个受到伤害的孩子,想报复……他一贯如此,总是同一切伤害过他的人一刀两断,想从此躲开。可是现实是无法躲避的——我们只能勇敢地面对现实。这就是我的性格。也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性格,子春则不然。其实世界上许多人也同子春一样,很多人都为了逃避现实,年复一年地浪费了自己的岁月。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母亲,让她把她一生的经历讲给你听?她完全可以亲口对你说啊。”有一次在布鲁塞尔的博伊斯一条小石子路上,我的舅妈露西·丹尼斯一边推着她那瘫痪丈夫坐着的轮椅,一边对我说。轮椅中病人流着涎,摆了摆手。太阳显得冷冰冰的,深绿的池面上只停着一只呆若木鸡的天鹅。(我的舅妈却像所有的布鲁塞尔人一样,硬把这个小池子称作是湖。)我这位瘫痪的舅舅当过将军,曾经是比利时王国的国防大臣。他名叫亨利·丹尼斯,是我母亲的堂兄。

“我母亲已有三十年不同我说话了。她一见到我,总是故意不理我。你知道丹尼斯一家人都是这副德性。”

露西舅妈连声“啧啧”。她长得很像一个胖胖的西班牙妇女。“是啊,玛格里特从来就是这个脾性。我听说有一次她爸知道她要和一个中国人约会,就把她反锁在屋里。结果,她竟把门踢出老大一个洞……门板厚极了,可也挡不住她,还是溜了出去。当时我虽只有七岁,可至今还记得这个门上踢出洞来的故事。”

我一直想写本关于我父母,关于中国的书。终于有一天我这个想法化成了具体的行动,犹如一颗种子那样滋长发芽,成长壮大,桠杈丛生,具备了大树的形态。正因为我自己也已是久经沧桑,曾经生活在革命的年代,我就必须回过头、向后看,回顾在生我养我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才能把我们这一代人改天换地的时代写出来。我真不知道该从哪儿写起,如何动笔?对我来说,中国自然就意味着我的父亲和母亲,意味着我所知道的一切有关中国的事情。如果将这些同我个人割裂开来,我的故事也就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空壳子。我这本书的树杆长得盘根错节,是一棵怪树,可它所反映的情况比任何一本关于中国的理想主义的作品都显得更加真实。

我不可能把我的父亲或母亲同历史、同他们呆在中国时期的那段历史分割开来,正如普鲁斯特*在写他自己时不能把他自己,以及他作品中的人物同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经历过的事情分割开来一样。因为任何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受历史的影响。我之所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由于1900年爆发了西方所谓的“拳匪”之乱的中国,正是由于这场动乱(中国人称之为“义和团起义”),我的父亲才没有成为一名儒学家,去当一名翰林,却和我那比利时的母亲成了亲。要了解一棵树必得要追到它的根,所以我的故事要从根上说起。

另外还有件无法与我的父母分割开来的东西就是铁路。汉语中这个词是直接来自法语 *chemin de fer* 这个词照字面意思译过来

*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小说家